









# 亚当斯总理在京举行答谢宴会

亚当斯总理和华国锋总理共祝两国友好关系的新发展

新华社北京六月十三日电 巴巴多斯总理约翰·迈克尔·杰弗里·曼宁厄姆、亚当斯和夫人，今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答谢宴会。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副总理陈慕华，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等应邀出席了宴会。

亚当斯在宴会上首先祝词。他对华国锋总理的政府代表团这几天能同中国方面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广泛的讨论表示高兴。他说：“我们对世界政治局势、特别是最近发生的国际事件的讨论，使我深感我们双方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是多么的一致。我们和你一

样确信缓和世界紧张局势以及采取一切措施来维护国际和平的必要性。我们和你一起呼吁超级大国尽一切努力使世界免遭核毁灭。我们和你一起要求早日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他说，双方在两国经济技术合作方面的讨论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他指出，巴中两国政府今天所签订的文化协定将使两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亚当斯在讲话中还谈到了第三世界国家之间进行经济技术合作的重要性。他对中国

与其他国家签订技术合作时所表现的绝对平等和尊重别国主权的精神，表示钦佩。

华国锋总理在祝词时说：“两天来，我们与亚当斯总理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就两国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和进一步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诚挚地交换了意见，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我们尤其高兴的是，对当前国际重大问题双方有着广泛一致的看法。”

华国锋表示相信，亚当斯总理的这次来访和双方会谈所取得的成果，必将大有助于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大有助于进一步发展两国间的友好关系。

亚当斯总理率领的巴巴多斯政府代表团成员出席了宴会。

今天上午，亚当斯总理和夫人等由财政部副部长张瑞清陪同游览了长城、定陵。下午，亚当斯总理的夫人参观了北京舞蹈学院。

## 中、日、金属有机化学学术讨论会闭幕

据新华社北京六月十三日电 新华社记者周光年从今天闭幕的中、日、金属有机化学学术讨论会获悉：现在很多国家的化学家正在通过研究金属有机化学变革化工方法，使化学工业生产的效率成千成万倍地提高；同时通过太阳光从水中分解出氢、研究核能的有效利用，以图进一步解决能源问题。

中、日、金属有机化学学术讨论会于六月十日在北京开幕以来，三个国家的近百名化学家通过这次会议沟通了学术思想，交流了科研成果，增进了友谊。挪威、西德各有一名化学家应邀参加了这次学术讨论会。

金属有机化学是一门有机化学和无机化学兼而有之的新学科。科学家们称它为“含有金属碳键的有机化合物的化学”。它在革新现有化工生产流程，开辟新能源，提供新的合成方法，以及了解生命现象等方面显示很大作用。参加讨论会的六十

一位中国化学家、十五位日本化学家和十九位美国化学家，共提出了反映他们在这方面研究成就的论文六十四篇。在这些论文中，日本化学家——京都大学教授熊田诚关于发展不对称合成的新方法、让二郎教授用石油气合成天然产物的研究成果、山本明夫教授关于金属有机络合物化学方面的研究成果；美国化学家——得克萨斯大学佩蒂特教授关于费歇尔——托布希反应（煤的液化反应）的最新进展、威斯康辛大学教授斯特斯关于开辟一种新的含有有机化合物合成的方法、见解等，都给了与会各国同行以新的启示，引起了共同的兴趣和关注。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黄耀曾教授在评试讨论的有机合成应用方面的研究，这个研究所关于把我国储量丰富的稀土做成有机化合物加以利用的研究，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关于利用太阳能把水分子中的氢分解出来作燃料的工作，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关于均相催化剂的固定化研究，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卢嘉锡教授、厦门大学蔡启瑞教授以及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和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对固酶活性中心模型的新见解等，都受到了外国同行的好评。

## 耿飚副总理回到北京

新华社北京六月十三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耿飚和夫人赵兰香一行，在结束了对美国的访问和在日本作短暂停留之后，今天下午乘飞机回到北京。

到机场迎接的有：国务院副总理姬鹏飞，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卫卫在官原元保雄，也到机场迎接。

## 印中工商会代表团访问北京

据新华社北京六月十三日电 正在北京访问的印中工商会代表团团长查特基特晚上对新华社记者说：“随着印中关系的改善，两国的贸易展开了广阔的前景。”他说，我们代

## 邓小平会见美国坦普尔大学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六月十三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今天上午会见了由马文·瓦克曼校长率领的美国费城坦普尔大学代表团。

去年邓小平访美时，坦普尔大学曾授予他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会见时，邓小平对美国朋友说，坦普尔大学是最早同我国学术机构建立联系的美国大学之一。早在一九七二年，瓦克曼校长就支持牛津大学同中国科学院进行合作研究，取得了很好的成

果。邓小平说，你们学校给予我荣誉法学博士学位，使我感到很荣幸。我同你们曾是校友了。这时，在场的美国朋友高兴地鼓起掌来。

瓦克曼表示，希望坦普尔大学同中国方面的学术交流不断扩大。

正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的坦普尔大学牛满江教授和夫人张葆英参加了会见。会见时，科学院秘书长郁文等在中



邓小平副总理会见由马文·瓦克曼校长率领的美国费城坦普尔大学代表团。

## 姬鹏飞会见阿尔及利亚红新月会代表团

据新华社北京六月十三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姬鹏飞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阿尔及利亚红新月会会长拉瓦·穆卢德率领的阿尔及利亚红新月会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

阿尔及利亚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费尔卡参加了会见。代表团是应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邀请前来我国访问，于六月九日到达北京的。杨纯曾设宴招待他们。

## 姬鹏飞会见新中友协主席杰克·尤恩

据新华社北京六月十三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姬鹏飞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新西兰中国友好协会主席杰克·尤恩。

尤恩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曾在北外外语学院任教多年，并多次访问我国，为加深中新两国人民的友谊做了有益的工作。会见时，姬鹏飞还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

今晚，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设宴招待尤恩主席。尤恩主席是六月十日到达北京的。

## 各民主党派发展一批新成员

李仙洲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表示要有生之年为祖国多做工作

新华社北京六月十三日电 中国各民主党派发展了一批新成员。

各民主党派于去年十月分别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选出新的领导班子成员。他们协助政府落实各方面政策，发动成员和他们所联系的人为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并为争取台湾回归祖国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了进一步开展工作，各民主党派从去年年底以来又发展了五百多名成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是以原国民党军政人员为主体的党派，最近吸收了一百二十名成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原国民党济南第二级军区中将副司令官李仙洲最近加入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这位八十六岁的老人表示，要有生之年为祖国多做工作。故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原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的大女婿郭翼，最近也加入了民革。

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沈其震、北京肿瘤医院院长吴光兴加入了农工民主党，并被选为该党中央的领导成员。

著名歌唱家张权、苏凤娟、李维勤、李光羲，最近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还有一百一十名台湾省籍同胞最近加入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国民主同盟、九三学社、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国致公党也都吸收了一批新成员。

新华社更正 十二日播“邓颖超副委员长、黄华外长唁唁大平首相逝世”稿，一段中“分别致电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临时代理伊东正义，对大平正芳首相不幸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应为“分别致电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临时代理伊东正义、日本国外务大臣大佐郁郎，对大平正芳首相不幸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见十三日本报第一版）

目前我国许多城市空气都有不同程度污染，一些大、中城市情况更为严重。以首都北京为例，城区空气长年含有烟尘，冬季取暖季节，呛人的二氧化硫比平时高出几倍，无风的日子，全城笼罩在烟雾之中。

为了逐步改变这种状况，现从如何改善城市民用燃料的角度，提出以下建议：

一、把无烟、低硫煤优先分配民用

城市空气污染的因素很多，主要原因之一是民用煤燃烧不充分，烟烟低硫，煤、柴排出的大量二氧化硫和烟尘不易飘散。民用煤所造成的空气污染对居民健康的危害比工业用煤要大得多。如果各地有关部门改变民用燃料的构成，把无烟、低硫煤优先分配民用，许多城市空气污染情况就会有所改善。

前些年，兰州市是我国空气污染严重的城市之一，甚至一度出现类似一九五二年的伦敦“烟雾事件”。一九七八年以来该市调拨了二十五万吨无烟、低硫煤作为民用燃料，加上其他一些措施，城区空气中的烟尘和二氧化硫含量随即减少了一半左右。我国煤炭中含硫量和硫磺含量的情况差别很大，褐煤中可以生成硫磺的挥发物有高达百分之四十四，无烟煤可低到百分之五。有的煤含硫高达百分之六，而低的只有千分之二。所以，有关部门在制订煤炭调拨分配计划的过程中注意把无烟、低硫煤优先分配给民用，这无疑是减少城市空气污染的有效措施。我国每年生产无烟煤一亿吨以上，如果拿出一半含硫低的作为冬季民用燃料，那么城市空气质量就会有明显改善。此外，把含硫高的无烟煤分配给有脱硫装置的工厂（如化肥厂）做原料，既减少了污染，每年又可多回收几十万磅硫磺，这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所以，按照不同的用户来分配不同的煤，把无烟、低硫煤优先分配给民用，把高硫、高挥发分有脱硫装置的或高烟烟的工厂，这应当成为我国一项重要的能源政策。

二、逐步实现民用燃料气体化

让大城市居民直接烧煤和木柴，不仅给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从资源利用角度看也是极不合理的。我国木料很缺，但城市引火每年就要烧掉大量木柴，仅北京一城，每年就要用七千五百万斤左右（据说有相当一部分是好木材）。城市居民直接烧煤，引火难，火力弱，为做饭要花大量时间，烟熏火燎自不必说，而且煤的热效率很低（只有百分之十五至十八）。民用燃料气体化应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可是，三十年来，城市民用燃料气体化发展缓慢，目前全国只有百分之十五的城市居民用上了气体燃料。我国的环境保护法提出城市居民用燃料要“大力发展和利用煤气、液化石油气（天然气）”，“积极推广区域供热”，“积极推广液化石油气、天然气”是烧油厂、炼焦厂、气田、油田的副产物，用于炊事烧饭的热效率可达百分之五十五至六十。据北京市的资料，一吨液化气可顶替八吨炊事用煤，用液化气比烧煤要合算得多。但目前

## 建议改善城市民用燃料结构

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 叶奕森

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 叶奕森

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 叶奕森

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 叶奕森

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 叶奕森

这些气体燃料绝大部分是被工厂或油田自己的锅炉、加炉加热了，有的则直接点了“天灯”，十分可惜。一方面大量浪费，而另一方面，为了供应城市高层建筑煤气，国家每年又不得不拿出四十万吨重油来制造煤气，这是不合算的。

目前影响民用燃料气体化的最大问题是资源和投资问题。这从国家整体来考虑，应该是可以解决的。国家只要从民用燃料中拿出相当五百三十万吨标准煤的煤和油，从炼油厂等单位替代出目前产量一半的液化气，四分之三的焦炉气和十分之一的天然气，就可解决我国三分之一城市人口炊事燃料气体化的资源问题。这样做的结果，不但可以减轻城市空气污染，而且每年可净节约一千万吨煤。这对当前节能工作也是一个很大的支持。城市民用燃料气体化的投资中有三分之二是表具、管线费用，可发动地方自筹，不足部分应当从节约的煤炭投资中补助。

“先原料、后燃料”的提法是妨碍城市民用燃料气体化的原因之一。对此要作技术经济分析。诚然，气体燃料可以做成工业原料。就氮肥生产来说，以煤为原料的工厂每到冬天往往因缺煤而开工不足。如果用气体作原料的、中小型氮肥厂，稍微压缩一点气体合成氨的生产，用腾出来的气体供给民用，再把替换下来的煤做工业原料，则既解决了民用燃料气体化的困难，又解决了氮肥生产原料不足的问题。

此外，液化气目前出厂价仅是零售价的四分之一，这也是生产燃气的单位宁愿自己烧掉，甚至放空的原因之一。为了调动产气单位把燃气供给民用的积极性，有必要对气体燃料出厂价格作适当调整。还要将气体燃料列入能源生产和分配计划，进行统一管理，建立必要的储运手段。

三、逐步实行区域性集中供热

城市要逐步实行集中供热，即因地制宜地采用大、中、小型锅炉、工业余热和地热能等方式，取代目前一家一户分散使用的煤炭炉和工厂的小锅炉。这样既可节约煤，又能减轻空气污染。目前最有普遍意义的是利用城市电厂的余热搞集中供热。一般的电厂用蒸汽发电，只利用了三分之一的能量，其余的热量都被白白放掉了。这些热量可用一定的工业措施加以回收，再送往附近工厂或居民区利用。集中供热的好处很多，尽管实行时要花一笔投资，但比开炉、运输煤炭要合算得多。

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 叶奕森

## 及早确定核能在我国能源中的地位

国家科委 徐泽光

核能是一种清洁的能源。第四，还因为核能是一种便宜的能源。核电站的造价比火电站大约要高百分之五十左右。但衡量电厂经济效益的最终指标应该是发电成本。由于核能发电费用低，核电的成本要比火电低得多。一九七八年美国一吨度的成本：核发电为一点五美分；煤发电为二点三美分；油发电为四美分。

一些同志担心发展核能是否安全。其实，只要采取“纵深设防”的安全设计原则和对设备制造、安装的质量严格控制，核电站发生特大事故造成死亡的可能性远低于水坝决口、飞机失事等。事实上，经过全世界大批核能工作者三十多年来的辛勤努力，核电站已积累了二千堆年（一座核反应堆运行一年为一堆年）以上的运行经验，从未发生过核事故。在引起轩然大波的美国三哩岛核电站事故中，受威胁最大的三个人所接受的辐射量，也只相当于每人进行两次X光透视。这一事件的最后结果，进一步证明了核电站的安全性。

展望我国未来燃料动力的结构，发展核能也是必要的。我国的传统能源虽然丰富，但按人口平均占有量来看，就不能算十分充裕。此外，由于分布很不均匀，开发、运输、利用都要消耗大量能源。这

样看来，核能对于弥补能源的不足，均衡能源供应是不可少的。以华东电网为例，预计到本世纪末的火力发电每年所需的供煤量，无论从华东境内煤矿状况或是运输条件看，都难以满足，出路只有发展核能这一条。从大力发展水电的角度考虑，核能也是必需的。西南地区水力资源一经开发，为了调节和保证电网的稳定，必须配备一定比例的热力电站。在山高路险的西藏边陲，只有核能才是这一巨型电网的最佳手段。

我国已具备发展核能的基本条件。当初为国防需要而建立起来的核工业、核设备制造、特种材料工业，以及核技术力量有很大潜力。发展核能可以使这些单纯的消费企业变成赢利性的生产基地，实行“军民结合”，既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也使企业本身路身于越走越宽。相反，如果不及早确定核能的发展方针，拖延下去，不仅对核工业的发展不利，也将造成核科技力量的浪费和散失，这个损失将是无法弥补的。

核能建设的周期很长，这是它的特点，因此需要及早安排。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发动各方面的专家，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反复论证和综合平衡，早日制订出二〇〇〇年或更长远一些的能源规划，确定核能在我国能源中应有的地位。

是不可取的。近年来在晋核考核中有过分强调外文和个人发表论文数量的倾向，这也助长了一部分人避实就虚的研究倾向。

马宗晋说，在四化建设中，有许多类似地震预报这样的科研难题，需要组织起来进行严密的分工去攻克。因此，在制定考核晋级等政策时，应注重对科技集体中不同岗位、不同工作方式中的科技人员，制订不同的考核标准和鼓励方法。（据新华社）

## 全国劳动模范马宗晋建议：

## 应当重视解决实际问题的科研工作

全国劳动模范、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副主任马宗晋同志最近建议：解决实际问题的科学研究工作，应当受到重视和鼓励。

马宗晋说，目前地震预报的实践和理论，都还处在不成熟的阶段，按现在的监视能力和取得的预

报信息，人们只能对一部分地震作出较准确的预报。他说，地学以现场观测为第一基础，因此，首先必须对地球和地震后的现场进行不懈的科学观测；其次，因对地震活动具有很大的区域性特点，这就需要结合中国地震实际的监视能力和取得的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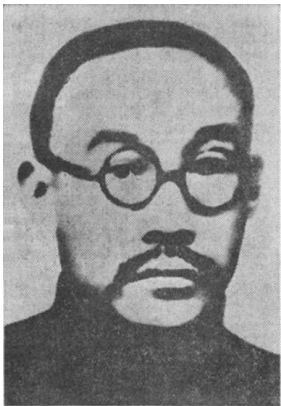
报信息，人们只能对一部分地震作出较准确的预报。他说，地学以现场观测为第一基础，因此，首先必须对地球和地震后的现场进行不懈的科学观测；其次，因对地震活动具有很大的区域性特点，这就需要结合中国地震实际的监视能力和取得的预

报信息，人们只能对一部分地震作出较准确的预报。他说，地学以现场观测为第一基础，因此，首先必须对地球和地震后的现场进行不懈的科学观测；其次，因对地震活动具有很大的区域性特点，这就需要结合中国地震实际的监视能力和取得的预



# 忆父亲何叔衡烈士

何实山 何实嗣



何叔衡同志

父亲——何叔衡烈士，牺牲已经四十五年。每当我们看到那张珍藏多年的父亲的照片，回忆革命先辈走过的战斗路程，心情总是久久不能平静。

父亲于一八七六年出生在湖南宁乡，一九二一年出生

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创立了中共湘区委员会，任组织委员。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后到上海，为党创办聚成印刷公司，开展我党地下工作。一九二八年赴莫斯科学习，同年在北京参加了党的第六次全国大会。一九三〇年回国，是共产国际救济总会和全国济会的主要领导人。一九三一年参加创建中央苏区工农民主政府，被选为中华苏维埃执行委员、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工农检查部部长、临时最高法院主席和内务部代部长。一九三五年二月牺牲于福建长汀，终年五十九岁。

一

一九一二年，父亲入湖南一师讲习班。一九一三年，毛泽东同志考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他们虽然相差十多岁，由于志同道合而成为最好的朋友。父亲对毛泽东同志极为钦佩，经常对人讲“毛润之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是后起之秀”。毛泽东同志对父亲也非常尊敬。常说：“何胡子是头牛”，“是一堆感情”，还说“叔翁才学”。当时的许多老同志都称道：毛润之所谋，何胡子所虑；何胡子所断，毛润之所赞。

毛泽东同志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时，经常是“身无半文，心忧天下”。一九一七年暑假，毛泽东同志约了一个同学以“游学”方式，徒步旅行，考察长沙附近五县农村。第一站就到我们家——宁乡杓子冲。毛泽东同志一看我家房屋那样简陋，对父亲说：“噢，你住在这个窝子里！”父亲欣喜万分，连忙告诉家里人：“来了贵客，来了贵客。”那时，我们姐妹还是孩子，也看出了毛泽东同志和父亲之间的真挚的友谊。他们有时转好场，调查会，有时在小卧室共议革命真理，有时一起向贫苦农民讲解农民为什么受苦，地主劣绅为什么享乐的道理，在家乡播下了革命火种。

那时，毛泽东同志和父亲、蔡和森等同志经常在一起讨论个人和社会如何进步的问题，深感有建立一个组织的必要，决定“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就在一九一八年四月成立了“新民学会”，“新民学会”成立的第二年，迎接了五四运动，会员由二十余人增加到六十六人。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学会改选，父亲被选为学会委员长，主持会议。这时，“新民学会”会员的活动主要分为两支：一支在国内，主要在湖南；一支

在国外，主要在法国。国内外密切联系，声气相通。一九二〇年七月，留法会员蔡和森等在蒙达尼集会，讨论“改造中国与世界”等问题。蔡和森等多数会员主张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仿效俄国的方法；另一些会员则认为为了改造中国和世界的革命，“不可以一部分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主张温和的革命，即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蔡和森等同志将他们的争论的情况写信告诉毛泽东等同志，征求国内会员的意见。同年十月，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罗素到长沙演说，在长沙的会员中更激起了各种不同的反映。一九二一年元旦，毛泽东同志和父亲召集国内会员集会，着重讨论上述重大问题。在三天的热烈讨论中，毛泽东同志和父亲深刻批判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潮，主张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通过暴力革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真为改造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不能外此。”父亲在讨论会上，热烈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并且提出：“新民学会会员一方面成就自己，多研究；一方面注意传播，从劳动者及士兵入手，将武人、政客、军阀之腐败专制情形，尽情宣布，鼓吹劳工神圣，促进冲突暴动”。通过这次讨论，“新民学会”的宗旨，由民主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

接着，毛泽东同志和父亲创立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

一九二一年七月党在上海召开了“一大”，中国共产党诞生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推选毛泽东和父亲作代表出席。

从此，中国革命开创了崭新的一页。

二

毛泽东同志和父亲参加党的“一大”后回到长沙，建立了我党湘区委员会。毛泽东同志任书记，父亲任组织委员。为了加强党、团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团结社会上进步的知识分子进行马列主义宣传，父亲积极支持毛泽东同志提出利用“船山学社”创办自修大学的主张。开始父亲是“船山学社”的社员，后来担任社长。

自修大学启发学员学习的自觉性，教师只负责提出问题、订正笔记、修改作文等责任。自修大学内附设一个图书馆，收集当时国内多种进步书刊报纸。学校经常开座谈会，讨论马列主义各种理论问题和中国革命的问题，有时还公开举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宣讲会，广泛吸收社会进步青年参加。毛泽东同志和他的弟弟、妹妹以及他的许多战友如夏明翰等，都是自修大学的学员。

父亲在主持自修大学的同时，还在这个学校附设的补习学校里宣讲马列主义，并发起筹办文化书社，介绍和销售《向导》、《中国青年》、《先驱》等党、团刊物和进步书刊。一九二〇年，父亲还利用主持通俗教育馆工作的合法身份，和谢觉哉、熊瑾玎、周世钊等同志编辑出版了《湖南通俗报》。《通俗报》办得轰轰烈烈、态度明朗。它揭露旧制度黑暗，传播新思想必生。湖南反动地方势力赵恒惕害怕《通俗报》宣传真理，说父亲是“过激主义”，报纸办了一年，就被撤职。

毛泽东同志和父亲在湖南发动和领导了驱逐贪劣湖南人民的皖系军阀张敬尧，大大推动了湖南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军阀运动。一九二四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父亲在湘区委员会，领导了重建湖南革命国民党的筹建工作。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一九三一年，父亲由上海去中央苏区。一九三四年中央红军长征，父亲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不久，

苏区变为游击区，一九三五年二月，党决定让他和瞿秋白、邓子恢同志一起转移到白区去，并派了警卫员护送他们出封锁线。他们白天不走走，只能晚上行军，爬山涉水，道路崎岖。后来，鞋子没有了，药品也用光了。这对年近花甲，疾病缠身的父亲，行走更艰难。二月二十四日，这支小队队走到福建长汀县境，天将亮时，来到一个村庄休息，正在煮饭，突然发现已被敌人包围。同志们边打边撤，父亲就是在突围中壮烈牺牲的。

父亲是个老秀才，曾经饱读诗书，具有丰富的旧学问。林伯渠同志曾说过：“旧学问一经和革命学问相结合，就和最新的学问——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蔚然发出奇光”。这奇光，照耀着父亲认准革命的方向，百折不回地走到底。

三

父亲有四兄弟二姐妹，全靠租地主的田耕种，过着艰难困苦的日子。

父亲出生那天，恰逢端午节的午时，又排行第五，群众中有迷信思想的人说：生辰逢五（午），将来准有出息。祖父信以为真，便省吃俭用，送父亲读书。父亲的青少年时代，一边读旧学，一边过着农村艰苦的劳动生活。后来中了秀才，乡里都称他“穷秀才”。

“穷秀才”目睹清朝腐败不堪的政治，民不聊生的痛苦，使他很早就具有了强烈的反帝反封建，推翻清朝政府的革命思想。为了解救人民于深重的灾难，父亲走上追求真理，学习马克思主义，救国救民的道路。

父亲最早在云山小学教书，他和同乡同事谢觉哉、王凌波、姜梦周等老一辈同志被人共称“宁乡四髯”。大家亲切地叫父亲“何胡子”。他们志同道合树立新学风，办学生会，提倡信用应用文，学习社会学、自然科学，遭到守旧分子的反对。旧派勾结地方豪霸，攻击他们“大逆不道”，并横加迫害。后来在父亲的影响下，他们都参加了革命，参加了党。于是“宁乡四髯”，更被称颂于湘中。

父亲还培养了夏尺冰同志（实山的爱人）。尺冰在我们家长大，他思想敏锐，对敌斗争勇敢坚决，很早就入了党。接着，父亲又送他去黄埔军校学习，大革命失败后，活动在湘东南一带，曾任湘东南特委书记。

一九二八年前后，我们姐妹因工作到了上海，在聚成印刷公司的一个工厂做工，秘密为党印刷文件。不久，父亲回国也到了上海，他常常教育我们说：搞地下工作很艰苦，环境也十分复杂。要提高警惕，防止叛徒出卖。他还严肃地要我们随时有革命牺牲的思想准备，耐心讲授应付敌探的本领。然而，不幸的事一下降临了：印刷厂遭破坏，我们姐妹被捕，实山的爱人杜廷庆同志在另处也被捕；不久，尺冰由另处被捉出来，在长沙被捕。两个女儿、两个女婿前后被捕，对父亲是多么沉重的打击啊！同志们经过年过半百的父亲仍昼夜不停地为党工作，都深感不安，四处奔波，设法营救我们。我们姐妹按早已准备的答词，经过审讯，敌人没捞到任何东西，不久由组织保释出来。杜廷庆同志刑满后，也获释放。但是夏尺冰同志却被惨杀在长沙的大马路上。父亲从报上得到消息后，把实山（现名石础）找去，强忍着眼泪说：“一个共产党员是不应死在病床上，你一定要死在大马路上。”实山明白了所发生的事，大滴的泪水夺眶而出，但她还是深沉地点了点头，发誓一定踏着烈士的血迹，彻底消灭反动派。

从那以后，国民党疯狂的大逮捕、大屠杀又开始了，上海的环境空前险恶。党决定让父亲转移到苏区去。临行前父亲设法让我们同他见了一面，在吃饭时，他把一九二八年去苏联留学时根据宋诗改写的诗

重读给我们：

身上征衣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生合是忘家客，风雨登轮出国门。

父亲语重心长地说：革命者就要抱定舍身忘家的决心。接着父亲又说：你们将来也会有机会到苏区的，那时我们又会在在一起的。谁知这次聚会，竟成永诀。临行前实山给父亲织了一件毛衣，他也给了实山一只刻有“衡”字的金戒指，后来红军撤出中央苏区，在江西余江县枋坑战友告别时，父亲以革命的深厚情谊，将这件毛衣送给林伯渠同志，供他长途途中御寒。林老感激地写下了给林伯渠的诗词：“……去国心绪都嫌重，风雨荒鸡盼早鸣。赠我锦袍无限意，殷勤握手别枋坑。”毛衣被保留了下来，献给革命历史博物馆了。可是那只金戒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了，至今下落不明。

四

和许多家庭比较，我们团圆的日子是太少了。正因为这样，关于父亲的音容笑貌，关于父亲的种种回忆格外珍贵，虽然事过数十年而不能忘却。

早年父亲在家时，就是一个极富同情心、感情热烈诚挚的人，直到今天，老年的亲友还记得他的许多感人的事例：家里来了逃荒要饭的人，他可以自己不吃，把碗里的饭倒给他；看到破衣烂衫，寒颤不已的穷苦人，他又脱下身上的夹衫给他；每当寒暑假回家时，就将那些读不起书的穷孩子招到他家，教他们识字，讲故事，讲革命道理，象一个诲人不倦的先生。以至于有的老同志称他为“老母鸟”，说他的到一个地方就象母鸡爱护小鸡一样，哺育着青年和孩子们。

我们姐妹参加革命后，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就更少了。有时见面时间也有有限。但每次父亲的爱护和教诲都给我们以鼓舞，使我们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感到安慰。

那时，条件十分艰苦，每月只有几元钱的生活费。父亲常常把省下的生活节省下来给我们，他说：“我就是天天吃大饼也可以过得去，我苦一些没什么，你们还年轻。”每次拿到父亲的这点钱，再看着他消瘦的面孔，粗布长袍，心里总有说不出话语，忍不住地要流着眼泪。

一九三一年六月，我们被党组织叫出狱后，实嗣搬到父亲住处。一天，父亲把我们带到身边，慢慢而低沉地说：“噢！你们被捕后，我好多个晚上睡不着觉，心情沉重，在屋里走来走去，想的很多。我总是有感情的。虽然说干革命总会有牺牲，一旦灾祸落到头上，也还是不能完全克制自己的感情。因为我身边只有你们四个亲人。一个已经被杀害，你们三人又在狱中……。后来，我特意了解过，知道你们没有暴露身份，没有出来组织，所以，我才向上级建议营救你们……”。时过五十年，父亲的话，父亲的形象，父亲的眼神，还是那么鲜明，那么令人难忘。

一九三三年，父亲在苏区给我们的最后一封信中，还谆谆教导我们要革命到底。并且担心地提到：“……实嗣为人可用一‘憨’字概括，憨厚原是好品格，可是做地下工作却令人担心，环境复杂，情况万变，如果不能锻炼得机敏灵活，就会给党的工作带来损失……”。多少年后，我们才知道，父亲写这封信时，就已受到“左”倾路线的迫害，并以右倾机会主义的罪名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但他仍关心党的主义和下一代。

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

接触过父亲的同志说：“何胡子是一堆感情，不是一堆肉，热烈的感情四射着，触着就要被他感动。”“他的感情，是控制在高度的正义感下面的。”是的，父亲亦赤诚热烈，磊落光明，他是一团火，一团炽热的革命的火，永远在我们心中燃烧。父亲革命的一生将永远放射出灿烂的光辉。



## 正确理解和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肖资法

我国的现代宗教，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这些宗教在我国都有比较悠久的历史，为部分群众所信仰。有的宗教，如伊斯兰教和佛教中的喇嘛教、小乘佛教，过去曾经为一些兄弟民族全民族所信奉，因此，宗教问题又常常与民族问题相联系。

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原理制定的，是我们党、政府对待群众信仰问题的一项基本政策。这一政策在我国宪法中作了明文规定，又在刑法第一百四十七条作了规定，给信教群众的信仰自由以法律上的保证。

我们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理解是：每个公民信教有自由，不信教也有自由；今天信明天不信有自由，今天不信明天信也有自由；信这个教或者信那个教，都有自由；每个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公民，在我们国家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都是平等的；信教人数多的宗教和信教人数少的宗教，地位也是平等的。

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具体体现在各个方面：各教都有全国性和地方性组织，各全国性宗教组织都有学院、刊物；各教都有过宗教生活的场所，都可以印刷出版书籍；各宗教团体或者宗教界人士，都可以同国际上的宗教组织和宗教界朋友进行友好往来。另外，不论是信教的还是不信教的公民，都有参加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政协都有宗教界的代表参加。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执行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成绩是很大的。但是，十年动乱期间，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受到了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马列主义关于宗教的理论被篡改，党对宗教工作的方针、政策被破坏，宗教工作机构被撤销，

宗教工作干部和一些爱国的宗教界人士，也受到摧残与打击，寺庙教堂被封闭、拆毁，宗教文物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宗教经书被焚毁，人们的宗教信仰横遭禁止。有人的把林彪、“四人帮”的这些倒行逆施，误认为是我们党的政策，怀疑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真实性，现在必须加以澄清。

有些朋友不理解，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为什么允许人们有信教的自由？其实道理很简单：

第一，唯物主义者是尊重客观事实的，是从实际出发来考虑问题和决定政策的。宗教是历史的产物，有它自身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既然目前我国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信仰宗教，我们就应该尊重这一客观事实，并在可能的条件下，帮助信教群众解决其精神生活方面的问题，如活动场所、用品等。

第二，宗教信仰是思想领域的问题，正如毛泽东同志多次指出的，凡属思想性质的问题，用强制的办法和手段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而且肯定会适得其反。所以只要有人信教，党和政府就采取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让人们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自己的信仰。

第三，虽然人民群众在信仰上有差别，但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祖国，实现四化这样一个根本目标是一致的。广大信教群众和全国人民的基本利益一致，这正是宗教界爱国人士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的政治基础。而采取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则有利于正确处理人民群众在宗教信

仰上的差别和矛盾，以巩固和发展上述的政治基础。这样，有利于增强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之间的团结，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同心同德搞好四化。同时，也有利于同各国人民的良好往来，团结各国人民和宗教信徒，进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

党中央十分重视宗教工作，粉碎“四人帮”后，重申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恢复了各级政府宗教工作的机构。各地宗教工作部门恢复工作以后，在落实政策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正确处理了宗教界的冤假错案，消除了对其家属子女的影响，在经济上帮助一些人解决了生活上的困难；帮助信教群众逐步恢复了——些宗教活动场所，群众正当的宗教生活已逐渐趋向正常；各全国性宗教团体和爱国组织也相继恢复了活动，有的地方性爱国组织和宗教团体也在逐渐恢复中；有的宗教团体已着手印刷宗教经典，恢复宗教刊物，重新开办宗教学校。落实政策的结果，信教群众是满意的，反映也是好的。今后我们宗教工作部门将要作更大的努力、更多的工作，使党和政府的宗教政策更好地得到落实。

为了正确地、全面地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有几个方面的关系应当全面理解、妥善处理。

一、信仰宗教的人与民族、民族以及四个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不论哪个民族，不论信什么教，或信哪一种教派，都必须把国家的统一、富强、

理，目的是为了从管理的角度来保证宗教信仰得到更充分的自由。管理是按照国家的法律、法令来维护人们享受信教或不信教的权利。

四、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打击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的关系问题。极少数违法犯罪分子，打着宗教信仰自由的幌子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这是政治问题，不是宗教信仰问题。因此，对这种人的处理，和宗教信仰无关。对这种人，如果不予打击，就会破坏宗教政策的落实，给国家、人民，包括信教群众和宗教界人士带来危害。只有坚决打击这种人，制止各种各样的破坏活动，才能更好地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五、宗教教职人员与宗教职业者之间以及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之间的“关系问题。他们之间应团结，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造成了彼此之间的隔阂。有些人把宗教信仰同爱国守法对立起来，片面强调信仰，甚至攻击爱国守法的爱国人员，这是十分错误的。我们认为，爱国守法，这是对每个公民的起码要求，不论是什么教，都应把爱国和爱教统一起来。信教群众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进行挑拨离间，制造混乱，破坏落实政策，影响团结。至于这个教派或那个教派之间，彼此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团结，有什么问题通过协商、妥善处理，不应互相对立、互闹矛盾，还要注意警惕别有用心的人浑水摸鱼，制造事端。

总之，我们必须完整地、正确地理解宗教政策，完整地、正确地理解和处理上面这些关系，以便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全面贯彻执行党和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以利于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同心同德投入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







